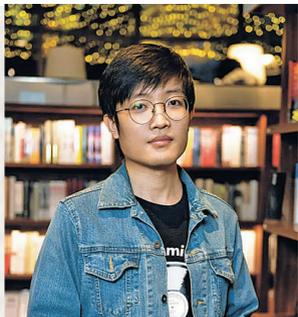


与作家 面对面



人物名片:

李唐,1992年出生于北京。高中时期开始诗歌创作,大学时期转向小说创作,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收获》《花城》等文学期刊,出版有《身外之海》《月球房地产推销员》《我们终将被遗忘》《热带》等多部小说集及长篇小说,擅长以奇幻元素探讨孤独个体的精神困境与情感联结。2020年获得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小说奖并凭借小说《热带》获得2020南方文学盛典“年度最具潜力新人”提名,2021年以《替代者》获第16届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奖。

90后作家李唐:

只要人类还愿意互相理解 小说就会一直在

李唐,作为90后北京作家,他的写作与同龄人的城市生活体验深深关联,却又常常跳脱其外。在新近出版的小说集《神的游戏》中,他展现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坐标;并未沉溺于具体的地域叙事或青春絮语,而是以北京这座高速迭代的现代都市为隐形背景,淬炼出一种冷峻而富于哲思的寓言式写作。

《神的游戏》共收录《神的游戏》《存在之虹》《星辰坐标》《等待》《边境》五篇小说,均围绕着记忆与现实、童年与成长展开。在《神的游戏》这部小说集里,李唐将现代生活的碎片,置入他精心设计的“游戏”场域,完成了一次对当代人精神状态的深刻书写。

从这本书开始,写作更加“肆无忌惮”

问:为何选择将《神的游戏》等五篇小说集结成书,几篇小说之间有什么逻辑或故事吗?几篇小说的灵感从何而来?是否受到某部作品、某个事件或某种哲学观念的启发?

李唐:前三篇小说,也就是《神的游戏》《存在之虹》《星辰坐标》,是同一时期写的,我称之为“伪自传三部曲”,其中虽然截取了许多真实的时代背景和环境,但故事毕竟还是虚构的,只是以“我”来讲述一切,彼此间也有点关联性。

如果说启发,可能来自阿根廷作家塞萨尔·艾拉——并不是题材和风格上的启发,而是一种写作态度。拉美文学作家的那种叙事的自由度,曾深深影响过我,比如艾拉说自己的写作叫“往前飞”,有种不管不顾的劲头。

问:如果用两个词形容这本书的独特性,你会选什么?它与你之前的作品相比,最大的突破在哪里?

李唐:从这本书开始,我的写作更加“肆无忌惮”了,少了许多条条框框,越来越觉得小说是可以包容万事万物的独特文体。如果说以前我的写作是“练习走路”,从这本书开始,我觉得自己走得稳了些,可以开始练习奔跑了。

问:你笔下的人物多有失眠、失语、妄想等状况,这种人物设定是否源于你对人类精神困境的观察?你想通过这些人物传递怎样的生命态度?

李唐:虽然我没有刻意想过“人类精神困境”之类,但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。我只是把我的所思、所见、所闻以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。如果我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写作者,就不可能装成海明威那样的硬汉。至于说生命态度,我想就是“自知渺小但还是珍视的事物”吧。小说中的人物,他们不是麻木的人,只是有些无力、犹豫不决,可是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坚持,哪怕那种坚持是以“拒绝”的方式出现的。

最想探索的主题,永远是“存在”

问:从《神的游戏》对校园暴力的探讨,到《存在之虹》对生命无常的追问,你的作品始终藏着对人性与存在意义的叩问,这些主题是否与你个人成长经历有关?你最想探索的主题是什么?

李唐:《神的游戏》书中的这五篇小说,确实与我的成长经历有些许关联,我也是第一次用虚构的形式来探索这种关联。我最想探索的主题永

远是“存在”,说白了也就是为什么活着,以及怎么活着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很难有确切的答案,否则我也不是一直写下去了,或许“写”的过程本身就是答案。

问:你的小说常通过梦境、追踪等元素构建虚幻世界,可能会让部分读者觉得晦涩,你在创作时会考虑“读者接受度”吗?如何平衡自我表达与读者共鸣?

李唐:我平衡得并不是很好,我确实不是那种有能力兼顾自我与市场的写作者。不过,我也相信作品首先要打动自己,才有可能打动别人。很多时候,正是因为我缺乏坚持自己的勇气,作品才会“四不像”——既打动了自己,也打动了他人,这就需要写作者付出巨大的真诚和努力。我不会在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畅销书,但会在意对自我和真诚的妥协。

写作治愈自己,希望善良的人都能站出来

问:作为90后作家,你认为这一代人的成长中,最独特的精神烙印是什么?虚拟世界的早期经验如何塑造了你们的现实感知?

李唐:我不敢说能够代表90后,但网络的介入确实是不可绕过的。90后尤其是95前,比较特别的一点是,他们正好处于前网络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分界线上。拿我来说,童年和少年时代,网络对我的影响很小,离开网络也能正常生活,甚至家长会刻意减少我们的上网时间,怕有“网瘾”(现在这个词几乎没人提了吧)。而当我们长大后,社会完全进入了网络时代,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深入到了家家户户。这使得90后既有前网络时代的记忆,又是第一代从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人。

问:文学在记录时代时,是否需要承担“治愈”的责任?

李唐:只能说是治愈自己。在中学阶段,也就是十三四岁的年纪,就像小说里写的,心智还未成熟但身体已经逐渐成长的少年们,如同“小兽”一般,蕴藏着危险的动物本能。校园霸凌其实很多时候就出于“兽性”的本能。我曾亲眼目睹过一些霸凌的场景,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

比如有一次,一个女生因为什么事惹恼了其他人,有人便拿课本狠狠

地朝她扔过去。课本砸到她的后背上,传出骇人的声响。那个女生只是默默地站着,什么话也不敢说。

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。有些同学会突然被高年级的同学叫出去,可能就会遭受暴力。

奇怪的是,我虽然从小长得文弱,却从未遭受过真正的霸凌。回想起来,或许是因为我虽然不是所谓的“坏学生”,但也从来没有敢于否定他们的做法;在他们施暴时,我往往充当了看客的角色。我的姿态甚至让施暴者以为我是站在他们一头的。而这种看客姿态,其实与站在施暴者一头并无本质区别。这样的想法让我每次想起来就很难受。因此,我会格外关注校园霸凌的新闻,这促使我写了《神的游戏》这篇小说。小说里的“我”最终站了出来,用自己的方式反抗了霸凌者,这算是我的愿望吧,希望每个善良的人都能站出来。

问:书中常出现“失意却智慧的引路人”,如诗人灵河。这类角色是否承载着你对文学传统或某种精神力量的寄托?你如何看待“迷茫”与“指引”在成长叙事中的意义?

李唐:灵河确实是,他是某种“指路人”的化身。青少年其实很期待有能够为他们指路的成年人,而不是命令、指挥他们的人,但是只有极少数幸运者才能真正遇到。好在我从书里找到了指引,那些过去的作家和作品,也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寄托。

现在更加有勇气,写以前不会尝试的东西

问:你14岁便开启诗歌与小说创作,文学对你而言,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?

李唐:以前,我的小说大多是“向内”的,比较封闭,属于内心的呢喃,是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。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的写作也在慢慢“向外”延伸。最明显的感受就是,我想写的事物越来越多了。我更加有勇气写一些我以前不会尝试的东西。

问:请问你是专职写作者吗?如果不是,这么多年来,你是如何平衡本职工作与创作的时间和精力?有没有过“工作拖累创作”或“创作影响工作”的矛盾时刻,又是如何化解的?

李唐:我基本上没有专职写过,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下班之后完

成的。可能是因为我的写作启蒙之一是卡夫卡,而他就是一个小职员。我觉得有这两重身份很“酷”——下班回家之后,就开启了另一个世界。当然,上班是很耗费人心神的,我自己要求不算高,争取每天写500字,如果能够坚持下去,一年也能写出可观的作品。重要的就是“积少成多”。

问:这种“双重人生”的状态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具体影响?比如工作中接触的人和事,是否成为了你笔下都市边缘人物的灵感来源?

李唐:哈哈确实会,但是不会那么直接,也就是截取某个部分来拼贴。写身边的人,我还是非常谨慎的,说不定就会惹来麻烦。我的灵感可能来自许多根本不认识的人,比如遇到的孩子、地铁上的乘客、饭店里的顾客等等,我喜欢观察各种人的神情动态,他们可能不是直接出现在我的小说里,但就像素描,间接地影响着我的人物塑造。

问:你早期写作有借鉴前辈作家的阶段,后来决心“用自己的声音说话”,这个转变的契机是什么?在形成独特风格的过程中,你做过哪些刻意的训练或尝试?

李唐:转变的契机,是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,写作仿佛进入了死胡同,写来写去似乎都一样。这样的瓶颈期持续了至少两三年。直到《神的游戏》开篇的三部曲才算慢慢走了出来。我逐渐发现很多东西必须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说,除此之外没有可供借鉴、模仿的声音了。从这一刻开始,我决定发现这个“必须的”声音。我没有刻意地练习,无非是在写作中尽量摒弃掉任何前辈的影响,就像忘掉过去招式的习武者,以初学者的姿态重新开始学习。

问:你曾说自己更愿意称自己为“写作者”,听到别人当面叫你“作家”会感到羞愧。从14岁开始写作至今,你对“写作者”身份的认知有没有发生过变化?

李唐:现在别人叫我“作家”还是会让我紧张。可能“作家”这个词于我还是有神圣性,觉得自己还达不到。我认为只有真正写出有价值的作品,才配称“作家”。我写出有价值的作品了吗?我自己也不确定,这个不是靠自己说说就行的。“写作者”相对朴实一些,而且客观。我现在仍喜欢称呼自己为“写作者”。

想表现的永远是人的精神,而不是某个地域

问:你既写当代都市,还涉足历史和科幻故事,在切换不同题材时,你会做哪些准备工作来避免内容悬浮?

李唐:我刚完成一部历史长篇小说,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。我一般会列出“衣食住行”四项,尽量还原当时的情景,尽量做到细节正确。

问:你的作品在叙事结构和主题表达上不断探索,哪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最让你“痛苦”?

李唐:其实最痛苦的是完成约稿,就是有交稿期限以及规定主题的稿子。我一般都是很想写某个小说才会动笔,即使中间经历挫折(基本都会有),也是一种乐趣。可是面对约稿,有时候就不得不逼迫自己,哪怕毫无灵感也要硬着头皮写下去,毕竟有交稿日期摆在那里。所以我尽量不接有截稿日期的约稿。

问:你认为小说在当下媒介爆炸的时代,承载着怎样的独特功能?故事是否是你理解世界的方式?90后的身份对你的叙事视角或题材选择有影响吗?

李唐:小说依然是人和人之间理解的桥梁。小说写作者最本质的书写内容,还是人类的情感,这是目前任何媒介,哪怕AI都无法提供的。我相信只要人类还愿意互相理解,小说就会一直在。你说得没错,小说也是我理解世界的方式,我在其中每走一遍,都对内心和外部世界多了一次了解和沟通。这相当于某种“自我疗愈”或者说“修行”。90后的身份倒是对我没太大影响,我喜欢文学的多元化,所以也会尽量多去尝试。

问:很多作家把故乡当“矿”,你把北京当“家”,却故意不在文字里“回家”,为什么?

李唐:我写过北京,不过是老北京,就是长篇小说《北京》。这本《神的游戏》写的也大多是北京。只不过,我不想重复前人对北京的书写,我更喜欢将现代经验融入地域中,我想表现的永远是人的精神,而不是某个地域。

正是因为世界的不确定性,文学才有意义

问:如果你对有同样经历成长困惑的年轻读者说一句话,你会说什么?

么?文学在不确定的时代里,能提供怎样的“确定性”?

李唐:我想说:“无论如何也要保持善良。”确定性无法靠文学提供。正是因为世界的不确定性,文学才有意义。

问:爵士乐对你的创作影响深远,你欣赏它“自由、质朴、贴近人性”的特质,这种特质如何转化为你的写作风格?比如在叙事节奏、人物塑造或主题表达上,是否有刻意借鉴爵士乐的“即兴感”?

李唐:我确实很喜欢爵士乐,我的写作也有点像爵士乐,几乎从来不会在开始时就想好后面的内容,而是随着叙事的发展一点点去寻找接下来的故事。而我也喜欢爵士乐的自由,这不是说随便便去写,而是在拥有技术的基础上,去勇敢表达,不被技术所束缚。我反复听的乐手有李·摩根和桑尼·罗林斯。

问:写作生涯中是否有过“顿悟时刻”或重要转折点?是否经历过自我怀疑,如何克服?

李唐:自我怀疑如影随形,但只要去写了,总有克服的时候。顿悟总是在写每一篇小说时产生,就像村上春树说的,当你走入一场风暴,出来时无论如何都会有什么东西被改变了。

问:你的日常生活如何滋养创作?是否有特别的习惯或仪式?

李唐:我算是对写作环境要求很少的写作者了,基本上有时间,有空闲就可以写。但写作需要“养”,也就是需要“无所事事”,如果心里总是被各种事情占据,是很难有余裕写作的。

问:你心中“成熟的小说”应该具备哪些特质,目前自己还欠缺什么?

李唐:什么是“成熟的小说”?其实我也不知道,甚至我有点害怕自己会“成熟”,我更欣赏发自内心的、野生的力量,或许是笨拙的、不加掩饰的。

问:你写作是为了什么?不写作时如何确认自己存在?

李唐:写作最终可能只是度过时光的方式,或者说内省的方式。不写作的时候我有时会觉得自己是个“空”(就像《星辰坐标》的开头那样),但“空”有什么不好呢?“空”是万物之源。

从未想过放弃写作,它是一种存在方式

问:你认为90后作家群体是否存在共性特质?在文学市场多元化的今天,青年作家该如何避免同质化,保持创作的独特性?

李唐:90后作家是多元的,其实我并不觉得像一些评论家说的那样“同质化”。我一直认为,坚持自我就是避免同质化的最好方式,无论我写的是什么,对自己诚实,对写作的事物诚实,就会有独特性。每个人都是不同的,写作亦然。之所以同质,其实是因为我们蒙蔽了自我,在用他人的声音说话。

问:你曾说“写作让生活多了一重维度,从心理层面上比现在艰难许多”,写作带给你的“痛苦”是什么?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,你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刻,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?

李唐:我从未想过放弃写作,写作恰恰是生活的某种疗愈。放弃写作只有一种可能,就是过得太好了,没有任何烦恼,但这是不可能的。写作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,就像有人喜欢钓鱼、下棋、打游戏一样,是喜欢做的事,谈不上坚持。

张嘉

文明贵阳 WEN MING GUI YANG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见贤思齐学楷模 崇德向善尚文明

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 贵阳市精神文明办 宣